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 现代公司与美国的政治思想

——法律、权力与意识形态

徐崇温 主编

[英] 斯科特·R·鲍曼 著  
李存捧 译



重庆出版社

义 研 究 丛 书

# 现代公司与美国的政治思想

——法律、权力与意识形态

徐崇温 主编

[英] 斯科特·R·鲍曼 著  
李存捧 译

重庆出版社 ▲

# STAKEHOLDER CAPITALISM

Edited by Gavin Kelly

Dominic Kelly

Andrew Gamble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1997 by

Macmilan Press Ltd

---

根据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1997 年英文第一版译出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公司与美国的政治思想: 法律、权力与意识形态/(美) 鲍曼(Bowman, S. R.) 著; 李存捧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1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ISBN 7-5366-5423-5

I. 现... II. ①鲍... ②李... III. 公司—企业管理: 行政管理—研究—美国 IV. F279.71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0161 号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 ▲ 现代公司与美国的政治思想

——法律、权力与意识形态

[英] 斯科特·R·鲍曼 著

李存捧等 译

---

责任编辑 李盛强 赵文峰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费晓瑜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66 千 插页 4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

ISBN 7-5366-5423-5/F·221

定价: 21.00 元

# 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 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在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凯旋进军，还是遭遇挫折，都在相当程度上同是否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关。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生活的速度。”（《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9 页）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列上，社会主义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体现出这种优越性呢？就客观原因来说，这主要是因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是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就主观原因来说，则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因而体现不出社会

主义的本质，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和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在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认为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帮助下，像俄国这样拥有农村公社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又再三再四地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435页）。

列宁更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看作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建设社会主义过程所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资产阶级当作旧的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开的主张，列宁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2页）他还强调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同上引第171页）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又特别致力于破除那种离开了社会结构的总体状况，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抽象对比的观察方法，坚决实行利用资本主义，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虽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但它毕竟在吸收外国贷款、引进先进技术等许多方面大大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在苏联第一、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大批利用西方技术和设备的大型企业拔地而起，在苏联以16.8%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只是从30年代下半期开始，由于斯大林认为干部、技术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这才开始收缩同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使苏联的对外贸易额从 1930 年的 16.43 亿降至 1939 年的 2.7 亿卢布，外资企业逐渐被取消，外国技术人员纷纷回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又压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斯大林还在 1952 年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认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瓦解，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场中，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斯大林文选》下册，第 595 页）。这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苏联更加陷入关门建设的状态。尔后，这种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理论和实践逐渐成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把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贸易叫做“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正是这种自我封闭状态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大大地拉大了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差距，后来，又成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终于在 90 年代初期陷于解体的一个经济上的根源。

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新的时代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而要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首先就要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调整：在生产力方面，它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把高新技术引进生产，使经济获得比较快速的发

展,如果说,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创造了有史以来人类生产力的总和的话,那么,从 20 世纪中期以来,它又创造了超过它自身在以前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它在归资本家私有的企业中推行所有和管理分离以及“雇员持股计划”却又实现有效控股;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它发展形形色色的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制度,缓和劳资之间的冲突;在消费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它广泛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福利国家”,缓解不断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在上层建筑方面,它建立系统的国家干预机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内构成一个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调节社会矛盾,避免社会爆炸。应当说,在这种变化的背后,资本主义的本质依旧,但面目已非。尽管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调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进行的,它并没有解决同不断发展的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相反地,这个矛盾还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着;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系列调整举措,又毕竟缓和了社会矛盾,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继续发展。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就苏维埃政权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资本主义当时的最新成就泰罗制问题指出:“它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操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3 版,第 491—492 页)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的上述一系列新的调整举措也应当这样看,这里面,除了包含有我们需要摒弃的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伎俩和手段之外,又显然包含有我们需要借鉴和吸取的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

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还是世界主题的转变,它们所改变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只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共处和斗争的形式。资本帝国主义始终想消灭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把它们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轨道;过去它主要依靠拿起武器发动侵略战争来达到目的。现在,则主要凭借其在经济、科技上的领先地位,控制国际市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接触,把它们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起内应力量,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84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一书中,就明确宣告:“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指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的影响越大。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也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消极因素,尽管同利用外国资本和科技加速发展带来的积极效果相比,毕竟要小得多,但要是不予正视,不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措施而听任其蔓延开来,却会形成严重冲击,遗害无穷,使社会主义变质成为资本主义的。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而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尊感和民族自信心。”(《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43—144页)而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要求我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

正是基于这种为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全面、正确地了解资本主义的需要,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推出这套《当代资本主义研



究丛书》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这套丛书以翻译国外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方方面面的论著为主，在适当时候再推出一些我国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论著。我坚信，在知己的同时又知彼，将有助于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抓住机遇，又经受考验，从而加快我们的发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世界发展格局中掌握主动权，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 前 言

本书主要讨论现代大公司所行使的权力。除了在其制度框架内分析法人权力问题外，我也试图解释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是如何有助于使这种权力具有其广泛的社会性的。为此，我追溯了美国政治思想和法律中所反映出来的美国公司的演变，分析了公司权力的（内部）组织和这种权力在市场和政治中的（外部）行使，探讨了与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扩散有关的一些问题。在提出一种与通行的看法大为不同的观点的同时，我也涉及了对美国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性质的讨论。

我必须承认，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让本书涉猎如此广泛的范围。我原来的目标相对有限，但后来走了无数的弯路，增添了新的内容，最后形成了现在的样子。起初，我打算分析美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学中有关公司权力的概念和学说，并评估它们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的学说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性。我的研究最终使我转向了别的学科——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这些学科包含着大量有关现代公司的研究。我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社会

学家并不对其本学科或者本专业之外的学科进行综合、分析,甚至谈都不谈。考虑到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所共有的密切联系,这种情况是不应该的。通过对这一信息库的材料进行综合,我们关于公司的知识就会得到极大的增加。受这种综合所可能产生的效益的鼓舞,我决定朝这一方向做一些预备性的工作。

在我大幅度地扩展了我的研究的范围之后,我最初确定的考察公司权力的理论概念的目标仍然指导着我的研究和分析。尽管采用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本身并不能解决理论问题,但它的确有助于廓清这些问题。某一学科领域的优势常常可以帮助人们看清其他领域的不足之处。通过这种研究方法,我逐步形成了一种能使我的研究兴趣初步定型的手段。如果在这里详细重述这一过程,极有可能使读者感到厌倦,因此我只着重谈谈其主要的特点。

我对美国公司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变化的研究使我确信,现在人们对公司权力讨论的一些重要内容是误入歧途了,至少是对美国历史缺乏足够的了解。由于我研究的重点是了解公司制资本主义是如何使市场由一个竞争的舞台转化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合作的场所的,法官和政治领导人的决策又如何影响了这一巨变的过程,所以我认识到自己有必要更深入地探究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通过这种研究,我逐渐理解了判例法和成文法在塑造和调整权力关系过程中的根本重要性——我发现研究公司权力的学生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足够的分析。我从法学和史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为我提供了一个有关理论问题的全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我洞察了公司权力的政治性(或者说是非金钱性的)本质,从此我对这种权力的本质就做了这样的限定。

然后,我就试图将我有关法律变化和公司的兴起的观点与我先前对美国政治思想中的公司权力问题的研究统合起来。这一做法提醒我,应当以一些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为线索来解释 20 世纪自由主义的演变。在这样做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理解了 20 世纪

大公司的增长如何影响了 20 世纪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人们如何修正自由主义观念以为大公司权力的兴起和强化辩护的。同时我试图把我在不同领域中的研究综合到一个历史的和概念的框架之内,以便从二个方面即公司内部和外部来解释公司权力的兴起。通过这一迂回的道路,我又回到了我最初的出发点。基于对各种著作的批评,我就可以明确自己一开始就确定的理论任务,然后提出一种有别于通行的关于公司权力的理论解释和概念体系的替代性理论。

本书汲取了包括史学、法学、政治学、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内的多种学科和领域的知识。我努力以一种合成的而不是选择的方式去综合利用这些材料。在这方面,历史主题是为了提供一种达到和谐所必需的共同的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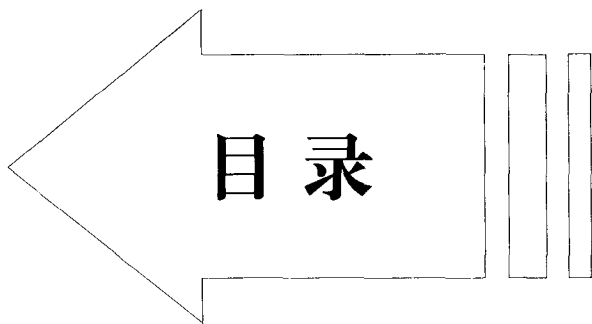
我希望本书能对日益兴盛的有关公司的政治学的研究能有所助益。公司权力这一课题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尽管最近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发展,对公司权力的有关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大大加强。过去社会科学的有关学科对这一课题的重视程度参差不齐。在几十年间,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考察现代公司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政治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相对来说是忽视了。

在提出这一指责之后,我还应当补充一句话,就是几年以前,正是一位政治学家,即理查德·L·斯科拉尔使我意识到公司权力问题对学政治学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新奇的挑战。作为我的导师和同事,他对权力和其它问题的理论视角在我前述的学术探讨的过程中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他对这一项目的批判性评价自始至终都是有益的,我深表赞赏。我对他所给予的启发,对他教给我的知识,尤其是他那帮助我将自己理论之谜的碎片统合起来的学术识见,永世难忘。碰巧的是,他对发展中国家中跨国公司权力的影响之研究和我对美国公司权力发展变化问题之考察,经由不同

的路径和不同的理由，居然将我们带到了同一个理论问题——或者如他所言，我们一直在“通过同一个望远镜的两端”观察这个问题。他是通过望远镜的“错误的一端”，意思是说我的观点要更好一点。但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在观察同一种现象。尽管属于偶合，但这种思想的交会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当我发现他对这一理论之谜给出的谜底与我的研究不谋而合时，我就更感欣喜了。

我还要特别感谢马丁·J·斯科拉尔，他对进步时期的研究影响和启发了我对公司资本主义、公司自由主义、反托拉斯法的发展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学说问题的思考。他还仔细而认真地审阅了本书的初稿，使我受益匪浅。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修改和加工我的观点帮助甚巨。我还要感谢其他几位学者，他们对全书或者部分章节所提出的批评、建议和意见，都是十分宝贵的。他们包括戴维·贝克尔、唐纳德·布兰德、厄尔文·路易斯·霍洛维茨、约翰·H·M 拉斯来特、杰夫利·拉斯梯格、小保罗·马提克、卡尔·帕里尼以及杜安娜·斯密思。

我要特别感谢宾州出版社的经理桑迪·撒切尔对本项目的热心关注。他杰出的业务素养和耐心帮了我不少忙。我还必须感谢高级初稿编辑佩姬·胡佛，她出色的编辑工作给本书增色不少。我还想感谢以下学生，他们在 UCLA 的学生研究项目的主持下，协助我做了不少的定稿工作，他们是：蒂姆·麦多考夫、依娜·德·古资曼、谢尔·格林、斯蒂夫·斯迈尔斯。最后，我想表示对我们全家，对伊夫·斯卡拉的谢意，他们自始至终地支持我，我还要对我的母亲沙龙·S·鲍曼、我的妻子苏珊娜特别地说一声谢谢，她们对我写作本书提供了独特的帮助。



# 目录

- ◆ 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 徐崇温 < 1 >
- ◆ 前 言 ..... < 1 >
- ◆ 第一章 公司权力 ..... < 1 >
- ◆ 第二章 大公司的兴起:法与法的理论 ..... < 38 >
- ◆ 第三章 美国自由主义的重建 ..... < 81 >
- ◆ 第四章 公司权力的巩固  
——法律规定及立法原理 ..... < 133 >
- ◆ 第五章 法人权力的管理理论 ..... < 189 >
- ◆ 第六章 建立一种关于公司的政治理论 ..... < 243 >

- ◆ 第七章 对跨国法人权力前景的回望 ..... < 297 >
- ◆ 译后记 ..... < 317 >

# 第一章 公司权力

类似合法性、权威、权力以及宪政这样的概念现在已经深入到有关现代公司的讨论中了。然而，这种方法揭示了一个严重的悖论。一方面，公司今天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的内在组成部分。它是做生意和生产、分配人们赖以生存的绝大多数物品的主导方式。其组织深入到了亿万人的日常生活模式之中——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存在与已有的政治组织的观念并不一致，也不存在任何能以将它与这类概念调和起来的理论。

格兰特·麦克尼尔 1966年

## — 引言

公司权力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的一大难题。作为一个具有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诸方面重要性的复杂现象，用简单的和



传统的政治学分析方法是不可能把它描述清楚的。也不存在任何能够为揭示这一神秘力量提供指导的现成的史学类比。美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本土的创造。它越来越体现出美国人所共知的实践天才——即那种即便在不懈地筹划下一次投资时仍然拥有的探究新的机会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的能力。从表面上看自 19 世纪的最初几十年起,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命运就与公司的增长死死地纠缠在一起了。通观共和国的历史,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公司都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扩张的主要力量。然而,美国的公司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和单纯的经济装置。它产生于政治动荡的年代,那时公司常常被赋予垄断权和排他性的特权,但又常常被人们指责为独裁的源泉。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公司只不过演变成为一种更强有力的控制美国经济和政治的手段罢了。

现在,大公司同时是一种法律实体(一种拥有权利和义务的拟制的和不死的人),一种由政府特许并受法律约束的企业,一种为其股东赚取红利的股份制公司,一种借以在内部(在公司内部)和外部(在社会中)行使权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机构。不过这一简短的描述只是剥开了公司权力问题的表皮。公司权力的每一方面——无论是在经济、法律、政治还是在社会中——都包含着其独特的一套问题和分析性的话题。

对政治学家而言,公司权力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挑战。它不受那些僵死的学科界线的束缚,更不理睬那些在意识形态教条中根深蒂固的有关社会实体的学说偏见。因此,对公司的政治学的研究是不能准确地归入学科分工的任何一个专门的领域或者其各种各样的分支领域中的。简而言之,这种研究要求有一种跨学科的、能够根据现代公司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来说明公司权力的复杂性的研究方法。

近一个世纪之前,我们现在所知的大公司作为消除竞争性市场之弊端的解决办法首次出现了。由于联合的战略取代了竞争,公